doi:10. 3969/j. issn. 1672-0598. 2026. 05. 011

复合型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与内在逻辑

——基于皖南H村的田野观察*

耿磊磊[1,2]

(1.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2.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安徽 铜陵　244000)

摘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核心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作为增强政党在乡村治理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治理模式,复合型治理适恰地回应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创新导向,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厚的学理基础。通过对皖南H村的田野观察,发现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情境,复合型治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领导主体,在双向赋权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经营统合机制的复合运作下,呈现出建构村庄共同体和巩固群众自治的复合治理成效。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成功实践,关键在于政党统合、柔性联结和价值形塑的三重逻辑,将分化的治理主体与零乱的治理资源整合至统一的治理体系中,最终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有效治理这一目标。

关键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样态;内在逻辑;复合型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 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5-0122-1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执政党保持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然而,伴随中国乡村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的演进[1],党领导的乡村治理因治理场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治理难度愈发凸显。一方面,遵循行政逻辑的科层治理不仅产生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危机[2],而且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政党领导的社会基础[3];另一方面,遵循自治逻辑的简约治理既遮蔽了正式制度的治理效能,也削弱了政党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4]。如何强化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地位?怎样处理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整合与分化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应对

* **收稿日期**:2024-05-2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BUCTRC202604)“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悬浮化’困境与政策路径研究”;2026 年黄山市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黄山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典型案例研究”

作者简介:耿磊磊(1990—),男,江苏徐州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铜陵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耿磊磊. 复合型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与内在逻辑——基于皖南 H 村的田野观察[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3(5):122-132.

基层治理任务的现实问题,又是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创新基层治理的学术命题。

关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研究,学界形成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视角:一是从“政党-统合”的分析框架阐释党建何以引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内在要求,又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要[5]。这暗含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6],体现了“将政党带进”乡村治理版图的本土逻辑[7]。二是从“结构-过程”的分析理路诠释党建以何引领乡村治理。党赋权基层党组织,以“一肩挑”、成立党建示范区等为实践样态[8],通过吸纳治理精英、动员组织群众和整合多元治理力量[9],将资源、价值和利益耦合成治理合力后,又通过分配、共识和调适等策略满足乡村社会多元主体间的需求差异[10]。三是从“功能-价值”的分析维度解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效果。基层党组织通过对协商机制的有效搭建,将多元治理主体吸纳至党建网格,形成“一核多元”的共治体系[11]。基于此,基层党组织将政治势能和组织动能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12],旨在实现基层党建的“去悬浮化”[13]、乡村治理结构的耦合重构和乡村公共秩序的再造重塑[14]。

总体而言,学界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形成了“党建何以引领、以何引领以及引领效果”的研究体系,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仍存在以下局限:其一,既有研究虽强调政党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性和主导性,但鲜有关注乡村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而并未充分考虑复杂乡村社会中党建引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互动与影响。其二,无论是以非正式规则调解的简约治理抑或是以正式规则约束的科层治理,皆因治理模式与治理场域的不匹配,都可能产生背离治理预期的治理结果,因而无法成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想模式。其三,基层党建虽具有治理属性和公共利益导向,但较少关注作为结构性枢纽的基层党组织通过“找回群众”以重塑乡村治理,较少从群众路线视角凝练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功能价值和内在逻辑。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与现状,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效模式研究,本研究基于复合治理理论,引入“复合型治理”概念以有效应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的复杂样态。一方面试图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多面向、深层次的理论观察窗口,另一方面尝试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提供方向引导。鉴于此,本文逻辑脉络如下:首先提出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分析框架,然后通过皖南 H 村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实践深描,探讨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多元主体、运行机制和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深入阐释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内在逻辑,以期为未来中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理论和价值引导。

二、复合型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复合型治理的理论基础与适配性引介

任何单一、线性的治理形态均无法适用于乡村社会的复杂属性。复合型治理因契合了乡村社会的不确定性而成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可能选择。复合型治理肇始于对单一主体治理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理论回应,杨雪冬早期从主体复合、内容复合、表征复合和目标复合等方面阐释其内涵[15];姚伟和吴莎认为通过形成多元主体间的复合理性、构建完备的权责体系和具体的运行机制,进而从根本上回应社会的复杂需求[16];王义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预期等不同要素整合的视角分析了复合型治理的具体应用[17];钱坤则关注通过对基层治理主体和治理功能的组合与优化,以此推动城市基层治理总体秩序的复

合化建构[18]。何睦基于赋能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的交叉视角指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绿色治理现代化需从主体能力培育、内容精准施策,方式流程优化等维度系统推进[19]。尽管学术界对复合型治理的研究各有不同,但大都包括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领域的多维度和治理工具的多样性,注重从多维、复合、多元等思维思考应对相对复杂的社会治理事务。

本研究之所以将复合型治理引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议题,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逻辑契合。其一,理论逻辑契合:复合型治理主要是为了弥补线性治理思维局限性造成的治理失灵,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正需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多元资源要素,形成超越单股力量的强大治理能力。其二,现实情境契合:现代乡村场域情境,村民需求日趋多样化,社会事务渐趋复杂化,复合型治理日益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范式。在乡村复杂治理格局下,创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模式亟需从多要素与多维度视域下的复合探索。其三,治理需求契合。在乡村社会中回应国家战略意志,迫切需要一种主动应对新挑战新问题的动态回应治理模式。复合型治理阐释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样态和内在逻辑,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实践运作方式。

(二)复合型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如何应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样态,始终是创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本研究试图审视复合治理理论与基层党组织的逻辑关联,在提取既有关于复合治理应用研究成果中的情境、主体的基础上,补充了契合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际需要的机制与效能要素,以强化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与抗逆性。因此,在提取情境、主体、机制和效能等多维要素复合治理的基础上,秉持“以复合应对复杂”“以复合助推善治”的思路,搭建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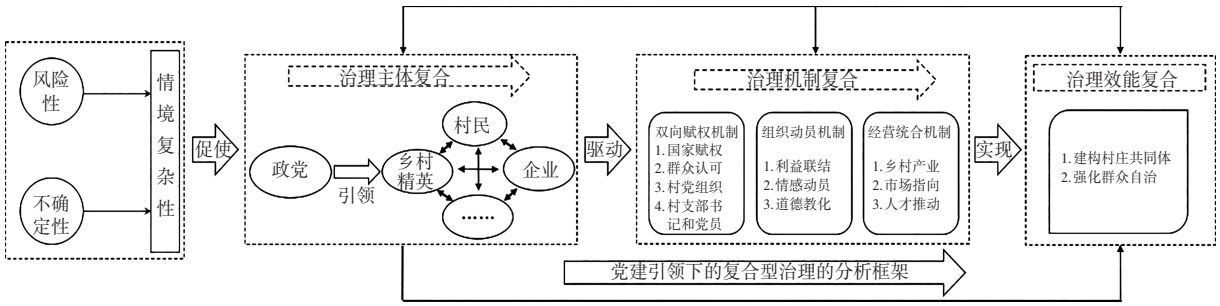


图1　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情境中,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生了诸如社会空间叠合、社会关系复杂、利益格局交织等结构性转型。乡村社会的复杂样态充斥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形塑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复杂形态。从治理主体来看,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主体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领导,统合乡村精英、村民和企业等多元主体,通过中心工作、动员组织和资源整合等方式将多元主体、多类要素统合起来,形成具有“跨主体”势能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从治理机制来看,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包含双向赋权、组织动员和经营统合三大复合实践机制。其中,双向赋权机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党授权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认可来增强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政治认同。组织动员机制是指基层党组织通过利益联结、情感再造和道德教化等策略激活乡村场域共同体意识,进而形成政党统合下的治理共同体。经营统合机制以村域内外市场精英和资源主体为统合对象,来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和提升村庄资源配置效率。从治理效能来看,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能实现常规工作与中心事务的

制度性转换。二者在复合型治理架构中交织并存、互动耦合,能针对不同治理事务灵活调适。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此种治理成效的实践表征为建构村庄共同体与强化群众自治。

综上,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在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治理情境中,遵循政党核心领导与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逻辑关联,通过双向赋权、组织动员和经营统合等复合实践机制,以政党授权与群众认可、村庄治理共同体和乡村共同富裕为运作旨趣,在常规工作与中心事务的制度性转换下,形成村庄共同体与群众自治的治理效能。可见,复合型治理不同于单一线性的治理思维,而是在乡村社会复杂情境的现实背景下,通过治理主体的统领性复合与治理机制的策略性复合,实现治理功能的叠加性复合,进而构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强大韧性,并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治理样态。

三、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实践样态

(一)案例概况

本文的研究缘起和经验素材来自笔者及所在团队于 2024 年 3 月 2 日—4 月 6 日在皖南 H 村所开展的田野观察。H 村位于 T 市 J 区西南部,村域面积 2. 36 平方公里,下辖 8 个村民小组,共 435 户,区域人口 1 268 人。其下设 3 个党支部,6 个党小组,村“两委”班子 7 人,现有党员 72 人,村民代表 45 人。

选择 H 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理论与实践契合,H 村为响应“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号召,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创新模式,其内部多元治理主体在村党组织的引领下被充分调动,呈现复合型治理样态,进而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养料。二是案例选择典型性,H 村原本是一个落后村,村庄社会情境较为复杂,自 2020 年以来,H 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在道路硬化、人居环境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23 年被 T 市评为美丽乡村示范村、“五星党支部”。H 村从落后村到示范村的转变为本研究提供了典型经验支撑。

为保证整个观察分析的“有血有肉”,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式收集资料:一是访谈法,分别与 H 村村民、党员和村干部进行广泛交流,获得他们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解与看法。二是参与式观察法,通过在村委会办公地与村干部一起办公、开会、走访村民等,深入了解场域中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真实现状。三是收集二手资料,一方面,通过从当地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文件中获取资料;另一方面,通过从互联网、新闻报道、报刊等获取资料。

(二)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社会情境

在基层社会动态流变与加速转型的背景下,H 村的复杂样态主要表现在制度杂糅、个体异质与秩序松散等方面。一是制度共存性杂糅:随着国家治理力量持续向基层下沉,诸多普适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不断嵌入 H 村社会场域,与内生性、灵活化的非正式制度并行共存。由于二者的生成方式与运行逻辑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制度张力,进而影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效能。二是个体多元性异质。H 村正经历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型,村民的思维方式、治村意愿和职业身份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再加上城乡流动加速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这些导致村民很难同他人轻易地熟识,而村庄内部的个体异质越高,治理场域面临的问题就越复杂。三是秩序松散性无序。快速流变的 H 村社会面临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礼治秩序”日渐式微。这主要体现在 H 村中的传统价值观与道德信仰约束力下降,加剧了

村民自利性与社会他利性矛盾。松散的乡村秩序增加了治理场域的复杂性。

(三)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多元主体

在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中,多元主体可以分为核心主体与非核心主体,二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中,村党组织可以视为核心主体,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乡村精英、村民和企业等被视为非核心主体,其在核心主体的引领与统筹下,通过一套相互嵌套、有机协同的运行机制,确保多元主体的功能耦合与协作互构,从而形成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首先,在H村,村党组织是政党在乡村社会中的战斗堡垒,是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关键枢纽。这不仅表征为在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等方面实现对村委会的引领和统筹,而且体现在负责制定宏观战略、整合多方资源和协调各类关系。总之,H村党组织能将其所坚持的群众路线的价值理念贯彻到乡土社会中,为治理体系提供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是治理结构中的“引领者”与“黏合剂”。其次,H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一肩挑起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等多副工作担子,全面领导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承担“一肩挑”的负责人S是经过村民“民主投票”选举而来,其能利用“一肩挑”的“兼职”身份实现对村级事务的全面介入和领导。这促使S真正“下沉”到群众中,听百姓之声、解百姓之忧、思百姓之需,做好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工作。最后,乡村精英参与治村因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H村,作为乡村精英的W紧紧围绕村党组织的治村规划贡献个人力量。他经历过市场经济的磨炼和考验,有着丰富的技术、人脉等个人资源,能为村庄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辅助支持。乡村中的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茶加工的J企业立足于村集体经济开展集体赋能,通过“资源性赋能—制度性赋能”实现村庄内生动力的激活。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最终受益者,在村党组织的引领与组织下,通过民主选举、议事协商、监督评价等多种渠道参与治理过程,是治理活力的源泉与治理合法性的基础。

(四)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运行机制

一是双向赋权机制。政党的能促性赋权与村民的认可性所共构的双向赋权机制形塑了村党组织的政治能动性。一方面,通过村党组织的网络编织增强政党权力的权威性,另一方面,通过村支部书记的实干性发展和党群的“在地化”互联提升村党组织的公信力。

其一,村党组织通过编织党的组织网络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执行力。在H村基层党建的实践过程中,村党组织编织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型组织网络。在纵向延伸层面,H村村党组织通过网格化党建延伸党组织链条,即将全村党员干部下沉到8个村民小组,构建了“行政村级党总支—村民小组级党支部—村民小组之下党小组”的三级联动网格。这不仅打破了村党组织的层级壁垒和空转悬浮,而且增强了村党组织的领导功能和服务功能。在横向拓展层面,H村党组织秉承“组织建在网格上、党员聚在产业中”的党建理念,将村党组织渗透至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中,先后成立茶产业基地党支部、农业技能培训党支部等2个党支部,实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全域覆盖。

其二,村支书是能够对村治实践产生最大影响的当家人。在H村,S书记善于捕捉乡村发展契机,积极向外争取产业项目,持续赋能村庄建设提质升级。“他(S书记)有干劲、有闯头,办法多、点子足;有赚钱的机会都想着大家伙,我们都支持他。”(材料整理编码:20240316)同时,在村庄温情的情感秩序和相

同的历史记忆中,S 书记凭借密切的人情往来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威望。“他(S 书记)性格外向、容易接触、有亲和力,都是不远的亲戚。”(材料整理编码:20240320)S 书记依托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关联,希冀通过村庄政治舞台来强化其治村权威的社会基础。

其三,在村党员能够从容搭建起覆盖全体村民的人际关系网络,依托深度嵌入村民生产生活的日常行动获取群众认同,进而在村庄公共舆论中收获正向评价,并借助常态化入户走访、生活化互动往来累积村民的信赖与支持。在村党员注重在生活场景中与村民互动,他们经常在餐馆、小卖部和田间地头等公共场所和村民拉家常、话里短,认真倾听村民的“心里话”,成为村民信赖的“村里人”。“S 书记和他们(党员)都是自家庄户人,没有官架子,会做人,懂人情,都和俺们打成一片”。(材料整理编码:20240326)

二是组织动员机制。农民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不能“等靠要”,而是由农民群众自身创造。因此,基层党组织依托复合型治理的组织动员机制,充分利用利益联结、情感动员和道德教化,激活村域民众的集体行动,激励村民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事业中。

其一,利益构成了村民行为的内在动力,是形成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在 H 村村“两委”班子的表率作用为满足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和增强村民对村集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村“两委”通过与村民、T 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协商沟通,了解各方需求关切,将分散的利益进行平衡整合;另一方面,村“两委”通过采用“村集体+”模式加强与个体农民的利益联结,形成了全民共参、风险共担、财富共享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村“两委”对村民的有效组织动员。由于利益契合与利益满足,H 村村民能主动转变观念和发挥能动性,自觉把发展村集体作为重要事业,进而增强对村“两委”的认同感。

其二,情感动员能形塑一种有温度、带有人情味的柔性治理机制。为凝聚村域情感共同体,村“两委”不仅搭建了乡村大舞台、百家宴等村民互动的“表演空间”,而且建设了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村民精神共鸣的“文化空间”,还组建了板凳会等村民表达内心诉求的“话语空间”。这将 H 村分散的村民聚集在同一个“时空际遇”中,将情感交流和人际交往融通起来,驱动村民在公共场域积聚情感能量。同时,H 村通过“差序性”动员构造以村“两委”为核心的“中心—边缘”情感动员网络。如在激活闲置土地中,先由党员和各小组长依据情感距离远近动员朋友、亲属等关系比较密切的村民,然后通过情感传递逐步辐射整个村庄。

其三,深层界面的道德培育是村民质性知识和思维框架的主要来源。国家通过“政党下乡”“制度下乡”等方式促使道德培育“国家化”。道德培育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基于国家正式制度和乡村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复合型治理规则。在 H 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村“两委”借助法律援引、制度设定等正式规则,以刚性方式规约村民生活行为,在村庄中形成整洁文明的环保道德体系。同时,人居环境治理属于小微治理的实践范畴,具有农民具体且鲜活的日常生活指向。在强乡土关系的 H 村,村“两委”遵循农民“过日子”逻辑,通过道德约束、道德示范等非正式规则,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柔性方式介入村民生活场景的方方面面,在村庄营造出“讲卫生、爱干净”的环保教化氛围。

三是经营统合机制。乡村的繁荣兴旺和共同富裕是复合型治理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设定了经营统合机制的致富架构和兴旺路径。运用经营统合机制中产业资源的集聚优势、开展市场化经营以及聚合多元市场精英等策略,释放出强劲的经济动能,最终在乡村形成繁荣富裕的局面。

其一,乡村产业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固本之基。村“两委”充分发挥“角色和空间”的能动性,为乡村产

业转型和壮大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角色能动性来看,S书记依托自身身份为H村争取财政资金、项目资源和补助补贴等资源,为本村产业升级和更新迭代提供物质支撑。从空间能动性来看,村“两委”的成员长期生活在地方社会中,利用乡土社会的文化关联网络,以灵活丰富的经营性实践和贴合乡村情境的动员策略,带领村域民众发展致富。如S书记发现茶产业有较大发展前景,于是组织动员一些具有冒险精神和经营能力的村民种植茶叶,同时,S书记联络W教授,依托其专业知识协助村民解决当地茶叶栽培、病虫治理中的各类技术问题。

其二,依据市场需求和利用市场机制是乡村产业市场化经营的应然之义。此种经营统合机制的市场指向是以党支部领办为基础,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以规模化生产、产业链延伸和品牌化赋能为动力。其中,村党支部具有权力、组织和信息等领办因素的先天优势。专业合作社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理想载体。近年来,H村支书、L茶公司董事长S作为村企联结代表,促使H村与L茶公司深度合作,使得村企合作逐步成为本村的社会资源优势。在H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茶加工产业过程中,为进一步释放村企共建效能和经济动能,H村党支部利用L茶公司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来发展本村的茶加工产业,形成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模式。

其三,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只有“人”的元素的协同发挥,才能实现产业资源的聚合共创。为此,这需要乡村产业振兴中“政府+市场”的有效互动。在H村,村“两委”借助政治势能将养殖大户、电商达人和乡土能人等熟稔和深谙市场运作规律的市场精英吸纳至乡村产业中。在黑猪养殖上,H村党支部吸纳养殖大户W至村“两委”,依托其出众的经济水平和丰富的市场经验,不仅为全村黑猪养殖、饲料育种提供高质量服务,而且激发了部分“消极小农”从事黑猪产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在茶叶品牌建设上,H村党支部吸纳返乡创业青年精英Y,依托其直播带货的销售渠道和流量效应,不仅提高了茶叶的线上销量,而且起到了对H村茶叶品牌的宣传效果。

(四)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治理效能

一是建构村庄共同体。村庄共同体是兼具稳定的权力结构、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紧密的利益关联等因子而形成的地域综合体。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遵循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依据特定权力、利益和价值系统而建构的村庄共同体。首先,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是通过“政党在场”来体现并发挥作用的,H村村“两委”“一肩挑”的创设实践,能对乡村精英、普通民众进行政治整合与组织动员,增强多元治理主体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认同,进而形成村域中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权力共同体。其次,由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乡土元素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建构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纽带。村民间的相互关系依赖彼此的生产生活关联,村“两委”正是借助人伦关系的亲密感,在院落门口、田间地头等公共空间与村民进行情感交流和道德教化,将村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建构“记得住乡愁”的文化共同体。最后,紧密的利益关联是村庄共同体形成的直接动力。H村利益共同体的成长与村集体的发展呈正相关,通过“村集体+”“村企合作”等方式将分散的村民利益整合至村集体中;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村民在村集体中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进而形成村庄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巩固群众自治。巩固群众自治是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价值旨归。回归群众本位的基层党建创新不仅能形塑调适有度的弹性治理结构,而且能构筑乡村治理的主体韧性。在乡村治理中,村庄和村民的共生性以及村民对村庄的依附性,决定了村民参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必然性。在H村,村党支部通过活化落实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机制,来纾解村治主体性缺位问题和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一

方面，H 村党支部通过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激活党员的身份意识和赋予党员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促使村民在“情景化”与“在地化”的党群互动中获得尊严感与认同感，进而激发村民群众参与治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H 村“两委”吸纳村域精英参与治理事务，借助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权威的地方性知识来激发广大群众的参与动力，最终让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行动主体；此外，无论是人居环境治理，抑或是产业繁荣兴旺，H 村党支部都直面群众偏好的生活治理诉求，尊重群众利益的差异性和群众主体的异质性，让村民收获更饱满的效能感和获得感。

四、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复杂情境下的政党统合逻辑

注重政党领导与社会参与有机融合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的鲜明特征。时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深刻嬗变，社会形态多元异质、社会利益多样分化、治理主体多元独立。社会情境的复杂性既弱化了部分治理主体，也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权责。这表明既有的治理状态尚未实现多元协同、有效共治的治理期许。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复合型治理生成了契合乡村治理需求的政党统合逻辑。复合型治理实践中的“政党统合”，主要是指以执政党为核心领导主体，统合乡村精英、企业和村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形成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复合型协同治理秩序。一方面，政党统合为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提供政治保障与组织支撑，避免了乡村精英、村民和企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无序参与和无效乱治；另一方面，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是政党统合的应然状态，既能为政党统合提供治理资源与合法性基础，又能为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注入社会活力。

H 村的治村实践表明政党在复杂社会情境下，主动适应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求，依托主体复合、机制复合与效能复合，构筑了“政党在场、社会自主”的复合型治理格局。这是政党以其强大的统合网络和统合能力去“再动员、再统合”日益分子化的乡村社会。在统合网络上，基层党组织凭借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以其高度组织化力量构筑全领域的治理统合网络。而统合能力主要体现为党员引领和精英吸纳。基层党组织通过实行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头雁引领，并统合乡村社会中的积极公民、经济能人予以“精英吸纳”，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带头示范、凝聚共识和宣传教化的作用，进而强化对乡村社会的统合与引领。可见，复杂情境下的政党统合逻辑突破了多元治理中权威弱化的困境和传统科层刚性管控局限，形成了具有范式革新意义的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这不仅是治理工具的迭代更新，更是使命型政党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彰显。

（二）乡土元素下的柔性联结逻辑

过于强调治村的专业性与正规性有可能降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适配性和灵活性。而依托“拟家化”、人情化的人际柔性能使得政党与农民、治理体系与百姓生活以更温和、更加柔性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尽管时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剧烈变迁，但村民的关系向度与人情取向未曾改变，乡村中的柔性因素依然弥漫在村域的各个角落。柔性联结在乡村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乡土元素，其暗蕴着存续、改善乡村治理效能的强大能量。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党员干部通过与村民人情化的行动逻辑和乡村社会中柔性元素契合，在微观行动情境内的慢慢勾勒渲染下，能达到彼此理解和相互信任的联结状态，进而可以转化为

影响和改变他人行为动向的“治理性应用”。复合型治理中注重柔性联结的投资与应用,因应着乡村社会的熟人底蕴与柔性因子,塑造党群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柔性情谊。这既保证了乡土中柔性秩序的稳定再生产,也承载了村民对政党的情感想象。

H村的治村实践表征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遵循村庄内生的乡土秩序,使得政党与村内各方主体、各种治理元素形成柔性联结,进而把村庄凝聚为有温度、有人情、有活力的有机体。在对村庄骨干的柔性联结上,H村党组织洞悉到青年精英和养殖大户等“关键少数”在乡村治理中能发挥表率示范作用,故包括S书记、普通党员等与乡村精英就村庄重要事情商议,利用他们与村民有类似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历史记忆等柔性元素,达成了与他们同心协力消除治村困境的柔性联结。在与普通村民的柔性联结上,一方面,H村党员干部通过入户走访践行群众路线;另一方面,H村党员干部高频率、常态化在小卖部、文化广场以及田间地头等生活场景与村民拉家常、话里短,耐心倾听他们的“心里话”,进而逐渐累积厚实的柔性资本,成为备受村民好评的“好干部”。

(三)以人为本下的价值形塑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强调人民的共建共治共享。“从人出发”的价值理性是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归位逻辑。一方面,政党需要通过“扎根群众”来重塑乡村治理,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为政党建构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当前,乡村传统伦理的现实维系力度有所减弱,民众的个体利益意识逐步觉醒。“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易被科层理性、技术理性遮蔽,进而对乡村社会造成冲击。价值回归下的复合型治理是党建引领与发挥村民主体性的有机结合。这不仅体现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更彰显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统一。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注重扎根民情、维护广大村民的主体地位,形塑一种围绕村民需要、契合民意、由民助推以及成果由民共享的复合型治理生态,进而使得政党、机制、民情在其中得以“互构并存”。

H村的治村实践展现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通过价值发起、价值扩散和价值内化等策略形塑出以人为本的实践秩序。在价值发起层面,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群众路线为价值底色,通过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和日常生活逻辑,来厚植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群众基础。这既能有效应对“强治理、弱价值”的结构化短板,也能有效应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农民缺位”的第一重壁垒。在价值扩散层面,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借助传统乡土社会的丰富情感,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进行横向扩散,使村民行动、乡土元素与政党统合衔接起来,形成复合型治理的有机耦合的整体样态。这既避免了“人本”乡土向“事本”治理的妥协,又能有效应对多元主体共治下“行动分化”的第二重壁垒。在价值内化层面,复合型治理有效融入社会和文化生态,通过组织动员、情感融入和道德教化将村民实践的柔性理念进行纵向深入,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特质。这既改善了以往向上负责的科层制度惯性,也能有效应对乡村治理中“泛行政化”的第三重壁垒。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复合型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分析框架,深描了皖南H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研究发现,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面对乡村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以政党作为核心治理主体,通过双向赋权、组织动员和经营统合等复合运行机制,实现了建构村庄共

同体和找回群众自治的复合成效。而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治理的成功实践,关键在于政党统合、柔性联结和价值形塑等内在逻辑,将多元分化的治理主体与零散分布的治理资源整合至统一的治理体系中,最终实现政党意志的有效贯彻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这一双重目标。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现代化。皖南 H 村复合型治理实践,为创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了适切性的经验借鉴。其一,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动能。复合型治理强调乡村治理的政治属性,将政党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视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基础支撑。个案研究发现,通过下沉党的体制势能和身份势能,实现对乡村治理的统合引领,进而维持乡村治理的有序运行。其二,权力维度的功能性分配。复合型治理建构了“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此种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是一种基于事务分工和职能分定基础上的权力分配。该功能性分权不仅促使村党组织尊重各治理主体的治理地位,而且消弭了政党权威体制和乡村有效治理的张力。其三,治理制度的“刚柔并济”。复合型治理形塑了“融法于情”的复合型乡村治理制度。村社共识的柔性规约与现代规则的刚性规范,使得复合型治理是一种在正式权威包裹下带有人情味和乡土味的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胡雯,芮国强.面向复杂性的复合治理:数字乡村韧性建构的可能路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64-73.

[2] 赵晓峰.“行政消解自治”:理解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一个视角[J].长白学刊,2011(1):73-78.

[3] 张新文,张龙.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基于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讨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92-101.

[4] 石亚灵,黄勇,肖亮.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乡村聚落空心化机制及规划应对——四川达州五通庙村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3(4):121-132.

[5] 于健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50-57.

[6] 曹龙虎.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性理论何以可能——理解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J].江汉论坛,2024(1):37-43.

[7] 牛牧晨.新时代再造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与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4(1):69-71.

[8] 徐信贵,庞鹏.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实践逻辑与规范协同[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233-244.

[9] 姜国俊,袁赞.找回群众与双向赋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基于 C 村美丽屋场建设的个案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8-131.

[10] 刘双,余智劻.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和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31-138.

[11] 陈秀红.整体性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J].学习与实践,2021(12):93-102.

[12] 潘琳.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路径探索[J].理论视野,2023(3):88-93.

[13] 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J].探索,2018(6):109-115.

[14] 张丹婷.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 98 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J].地方治理研究,2024(1):28-40,79.

[15] 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4):61-77.

[16] 姚伟,吴莎.复合治理: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初步应用[J].理论界,2017(6):108-115.

[17] 王义.复合型治理:破解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逻辑进路[J].东方论坛,2023(4):149-157.
[18] 钱坤.城市基层治理秩序的复合化建构[J].兰州学刊,2022(9):69-79.
[19] 何睦.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绿色治理的价值逻辑、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6(5):74-81.

Composite Governance: Practical Patterns and Inherent Logic of Party-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Field Observations from H Village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GENG Leilei[1,2]

(1.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the Tongl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Tongling 244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Party-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is a cor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good rural governance and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a governance model that enhances the legitimacy, author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 in rural governance, composite governance appropriately responds to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nnovative orientation of Party-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is grounded in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rough field observations in H Villag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complex circumstances of rural society, composite governance operates with the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 as its core leadership actor. Through the composite operation of three mechanisms: two-way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operational integration, composite governance produces the composite governance outcomes of building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consolidating mass self-governance. The success of composite governance under Party leadership hinges on three interrelated logics: Party integration, flexible linkage, and value shaping. These logics integrate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actors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resources into a unified governance system,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goal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under Party leadership.

Keywords: Party-building leadership;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al patterns; internal logic; composite governance

(责任编校:杨 睿)